



# 宫内、朝廷与边疆

——社会史视野下的明代宦官研究

齐畅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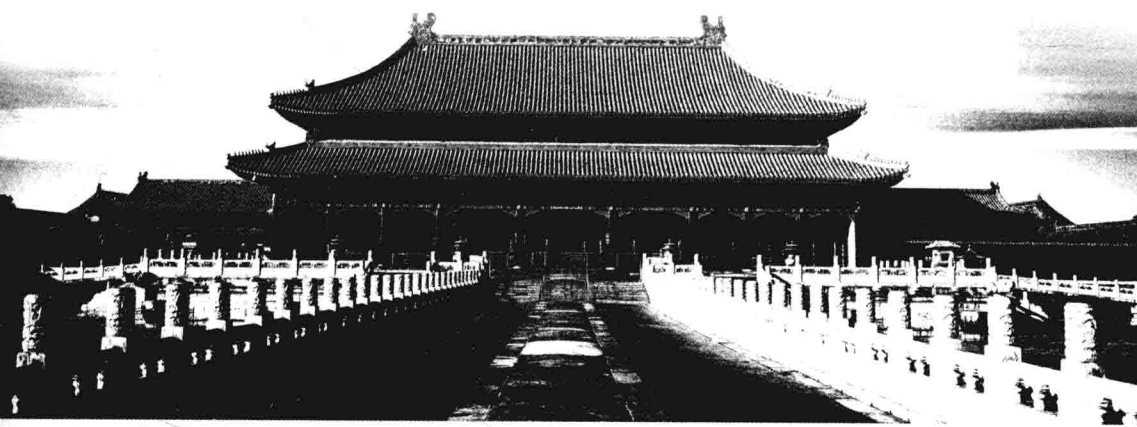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宫内、朝廷与边疆

——社会史视野下的明代宦官研究

齐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宫内、朝廷与边疆：社会史视野下的明代宦官研究 / 齐畅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9

ISBN 978 - 7 - 5161 - 4295 - 0

I. ①宫… II. ①齐… III. ①宦官—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D69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6517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董晓娟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25

插 页 2

字 数 227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北师范大学“双十”项目：

“东亚世界的形成、裂变、重组与未来走向研究”成果之一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5批面上资助（编号2014M551148）

# 目 录

<b>第一章 绪论</b> .....	(1)
第一节 问题与思路 .....	(1)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5)
一 相关理论的反思 .....	(5)
二 政治史范式下的宦官问题研究 .....	(7)
三 关于宦官的社会史研究 .....	(12)
第三节 史料的分析与反思 .....	(17)
一 传统文献史料的局限 .....	(17)
二 墓志及碑刻史料与明代宦官研究 .....	(23)
三 以碑刻为主的综合史料的运用 .....	(29)
第四节 个案选择意义与论文结构 .....	(30)
一 个案选择的意义 .....	(30)
二 思路与结构 .....	(31)
<b>第二章 宦官在明代边略中的角色——女真宦官个案</b> .....	(33)
第一节 宦官与明初东北边略——刘通、刘顺个案 .....	(34)
一 少数民族宦官与明初的边略概况 .....	(34)
二 刘氏兄弟入燕府 .....	(36)
三 刘氏兄弟与靖难之役 .....	(42)
四 刘氏兄弟的随驾出征 .....	(45)
五 军功宦官的特别恩宠 .....	(55)
第二节 宦官与皇权的渗透——钱能个案 .....	(58)
一 钱氏一门四宦官 .....	(59)
二 钱能出镇云南 .....	(67)

三	宦官与皇权的运作 .....	(69)
四	钱能得以善终 .....	(73)
	本章小结 .....	(77)
<b>第三章</b>	<b>武宗“八虎”新识——高凤及其家族个案 .....</b>	<b>(78)</b>
第一节	高凤的家族概况 .....	(80)
一	恩荫一门 .....	(80)
二	高凤侄孙——藏书家、目录学家高儒 .....	(82)
第二节	知识宦官高凤 .....	(83)
一	内书堂正途出身 .....	(83)
二	弘治、正德日渐得宠 .....	(86)
第三节	《实录》与墓志比对中的高凤形象 .....	(87)
一	招权纳贿 .....	(87)
二	高得林升职风波 .....	(89)
三	高氏一族得以善终 .....	(92)
	本章小结 .....	(93)
<b>第四章</b>	<b>嘉靖朝政局中的宦官——麦福个案 .....</b>	<b>(101)</b>
第一节	嘉靖初的政治环境与麦福墓志考 .....	(103)
一	嘉靖初年的政治环境 .....	(104)
二	麦福墓志考论 .....	(107)
第二节	“大礼议”中的麦福 .....	(114)
一	麦福与御马监草场的变革 .....	(115)
二	麦福与裁革冗员 .....	(120)
三	麦福与张廷龄案 .....	(123)
四	与议礼诸臣的关系看麦福在大礼议中的态度 .....	(127)
第三节	麦福与嘉靖中后期政事 .....	(130)
一	开司礼监掌印兼总东厂先例 .....	(130)
二	麦福与庚戌之变 .....	(132)
三	麦福与仇鸾倒台 .....	(135)
	本章小结 .....	(137)

---

<b>第五章 东林清流与宦官——陈矩个案</b> .....	(141)
第一节 东林、阉党以及陈矩其人 .....	(141)
一 “清流”与“阉党” .....	(142)
二 陈矩生平 .....	(144)
第二节 阉党与清流之间 .....	(156)
一 “国本案”中的陈矩与东林清流 .....	(156)
二 宦官、清流之交——陈矩与沈鲤、李三才 .....	(159)
第三节 清流与宦官的互动 .....	(164)
一 主动结纳 .....	(164)
二 讳言关联 .....	(166)
本章小结 .....	(167)
<b>第六章 结论</b> .....	(169)
第一节 墓志与文本:史料之间的对话 .....	(169)
一 墓志的历史价值 .....	(169)
二 墓志对古代文学的助益 .....	(171)
第二节 宦官在明代国家机制中的作用 .....	(173)
一 增加地方机构的灵活性 .....	(173)
二 补相权之阙 .....	(175)
<b>附录 明代朝臣士大夫为宦官所撰墓志一览表</b> .....	(180)
<b>参考文献</b> .....	(194)
<b>后记</b> .....	(204)

# 第一章

## 绪 论

### 第一节 问题与思路

宦官问题向来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传统史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据文献记载，中国的宦官制度可上溯到西周时期，之后便伴随着整个古代社会而存在，并且在汉、唐、明三代宦官专权达到了高峰。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对宦官的评论代表了传统史家的思维模式：“奄宦之如毒蛇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sup>①</sup> 黄宗羲之父黄尊素是东林名士，在明熹宗天启年间官至御史，但因屡次上疏弹劾权珰魏忠贤而被下狱致死，黄宗羲在明末以抨击声讨阉宦和阉党为己任，与这段经历也是分不开的。宦官这一伴随君主制而生存的特殊群体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甚至在某些时期完全操控国家权力，被视为传统社会的毒瘤，因而为历朝文人、统治者所鞭笞、警惕，成为重要的话题。对宦官的记载和研究体现出明显的经世致用目的，即“以史为鉴”，防止宦官之祸造成君权旁落。

梳理 20 世纪以来关于宦官问题的研究，发现宦官专权乱政仍为研究者情有独钟。20 世纪 40 年代，丁易在国共内战即将开始的特殊环境背景下写了《明代特务政治》，以影射国民党“黑暗”统治，不能不说使人们产生了对宦官的妖魔化印象。在当时的斗争情况下，历史的确是有力的武器，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但在学科意义上就宦官问题本身而言，专权祸国并不是其唯一定义，高墙内的权力斗争也不是其全部内容。宦官作为传统社会政治网络中的一个结点，不该被剥离出来而刻意强调其天生的

---

<sup>①</sup>（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奄宦下》，《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毒瘤本性”。20世纪60年代，台湾明史学者吴缉华注意到从明代政治制度的缺失上论证宦官专权的必然性<sup>①</sup>，较近的大陆学者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中，亦从这一认知出发，开始将宦官群体放在整个传统社会政治网络之中，对其活动展开探讨。<sup>②</sup>

“当历史著述的主要内容都是政治史，所依据的材料都是政治方面的文书档案，把政治层面的因素看成是决定历史发展变化的关键力量，同时尽量从政治方面去解释历史，其功能也是服务于国家政治统治的时候，政治史就是一种史学范式。”<sup>③</sup>无疑上述学者的研究是政治史范式下的宦官研究，而较近的国内的学者也多在此主流范式影响下继续探讨宦官问题，并且由过去主要着眼于政治权势、特务活动，扩展至从其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关系以及主要宦官生平等多个角度进行探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宦官形象大概是这样的：这个群体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手段与国家政权拉上关系，并大多数施予坏的影响，摧残社会经济、加速军队腐败，甚至背负亡明的重大责任。

传统儒家士大夫道德标准下的“忠”、“奸”仍然是判断宦官群体的主要准则。而这正是影响历史研究者对历史进行解释的干扰因素，黄仁宇曾重复强调的一句话“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sup>④</sup>这也正是笔者对宦官群体研究的旨趣所在，刨却这种传统士大夫的成见，即使宦官是传统社会和政治的毒瘤，那么在明代国家机制运行过程中宦官的毒性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在社会史研究萌发的20世纪初，新史学观念大力倡导打破传统政治史狭窄的研究领域，将更多的目光投放于民众的生活史，带动了一场“眼光向下”的学术革命，开辟出了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广阔研究领域。<sup>⑤</sup>这种研究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再度兴起，因此明代宦官的研究也呈现出更加多样的色彩，以往不被关注的宦官的社会生活、社会角色、心理

---

① 吴缉华：《明仁宣时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僭越相权之祸》，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1本，1960年12月。

② 此方面的研究成果笔者将在学术史回顾部分加以展开。

③ 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④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序言部分。

⑤ 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状态、教育、婚姻等状况被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史学视野的扩展对宦官研究的全面、深入固然大有裨益，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眼光向下’看历史把目光投放到更为宽阔的领域，使史学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并由此带动了史料来源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但研究者的立场却因缺乏主体的自觉，有可能依然是高高在上的，可能会不自觉地带有某种猎奇猎艳的色彩，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对于我们过去知之甚少的东西进行了解的欲望，而没有真正采取一种同情理解的立场。”<sup>①</sup> 放眼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关于宦官的社会史研究，专门的成果本就不多，以猎奇猎艳为目的来吸引眼球的宦官通俗读物却开始泛滥，使人们对宦官的社会史研究产生错误的印象，真正违背了“新史学”的初衷。

那么，作为社会角色、社会生活中的宦官群体其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呢？他们在社会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怎样的呢？赵世瑜所写的《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这篇文章与以往关于宦官的研究都不同，可以说它开辟了宦官社会史研究的新领域。首先从史料上，不再以带有儒家士大夫意识形态所撰写的正史资料为主，而选择了北京八宝山刚铁祠庙的碑刻——那些曾被史书刻意遗忘的宦官自己的记忆，真正从以往“自上而下”的眼光转为“自下而上”，看宦官是如何塑造他们的英雄，展现宦官的政治，通过宗教信仰问题了解宦官与民间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密切互动关系，看到与以往完全不同角度的宦官整体形象。了解底层宦官，而不再只关注像魏忠贤、刘瑾等个别臭名昭著的“奸”宦或郑和、怀恩等个别“良宦”，将视野扩大到整个宦官群体，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反映宦官的政治。他的关怀是整个宦官群体，追求的是一种整体史观，而不再只是政治史视野下的权力塔顶端的奴隶，实现了社会史与政治史的对话。

得益于前辈时贤对宦官问题的研究和社会史与政治史可以对话的学术理念，借助于碑刻、墓志等新史料，我们才可以在传统明代宦官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与反思。

---

<sup>①</sup> 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首先，对宦官群体的道德评价问题。关于明史的传统叙述，总有“宦祸亡国”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个别奸宦掌权扰乱当时政局，使政权腐败，不失为一种说法。若笼统将国家兴亡的责任归于宦官集团，显然有诿过于他人之嫌。历史上存在大量祸国的奸宦，但也有大量祸国的官僚士大夫，没有人去全盘否定他们，但宦官却往往被笼统地加以否定，作为一个负面的群体形象出现。从而形成了这样一种畸形的道德评价：同样做事情，官僚士大夫大多数是好的，宦官大多数是坏的，官僚士大夫的恶行并非他们行为中的常态，而宦官的为祸是常态，为善反倒不正常了。这种单一的道德评价自然不仅仅存在于针对宦官的研究中，而是史学界中较为常见的。追究原因，我想正是由于我们研究宦官或者其他对象的历史，所用的资料大多是出自儒家士大夫的笔下。流传后世的官私文本，自然以儒家的道德标准和官方的意识形态来书写历史。而我们今天的有些人仍不能剥离史料上的主体成分，将一切尽信为历史的实况，跟在前人的后面对宦官大张挞伐。墓志碑刻等社会史料的利用为我们揭开宦官的另类记忆，也对士大夫与宦官的实际交往情况有了新的思考。

其次，明代的宦官群体只是明代整个国家权力网络中的一个结点，无法超越整套制度的规范。黄宗羲曾说过：“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预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sup>①</sup> 传统精英士大夫皆以明代宦官的全面参政，认为其擅权干政破坏国家政治，是传统社会的毒瘤。

诚然，明朝的宦官似乎比汉、唐时期对政治的渗透力更强，但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他们并不如汉、唐时宦官能轻易废立皇储、掌握军权，明代的宦官能让阁臣为之折腰，却总也触及不到皇权的威严。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制度，仅限于恪守本分、服务皇室，但其实际权力却远远超出了制度规定的范围。作为国家政治权力网络中的一个结点，宦官在这种权力的运作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却没有任何制度上的规定来保障其参与国家政治过程中，能理直气壮，所以明代宦官爱揽权的说法不绝于耳。那么究竟是什么

<sup>①</sup>（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奄宦上》，《丛书集成初编》。

造成了明代宦官群体这种特殊的地位？对比清朝宦官能够束手，我们看不出清朝初年比明朝初年统治者对宦官干政问题有何更高明的防御措施，然而宦官却没能有机会站到统治舞台的中心。究竟明朝国家机器在运转过程中缺了哪一环而要用宦官来加以补充呢？笔者想这对于了解整个明朝国家机制的运行更有意义。

再次，以宦官为切入点所反映的明代民族与边疆问题。少数民族宦官是明代宦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成祖发动的“靖难”之役中，在阵前效力最著功勋的都是少数民族宦官，明代史籍中屡次提及的女真王彦、回回郑和、西番人孟骥、蒙古人云祥等皆在此役中崭露头角。明成祖迁都北平后，为应对漠北蒙古军事势力的威胁，成祖先后五次亲征漠北，许多在“靖难”中骁勇善战，屡立军功的少数民族宦官遂多次随成祖出征，亦为巩固明代边疆作出贡献。那么，这些少数民族宦官在明代宫廷中地位如何？他们在明代的边略中扮演何种角色？这可以反映明初与女真关系的一个侧面，也有助于观察前近代时期东亚区域社会的历史细节。

最后，宦官常常被作为负面群体而出现在人们面前，他们是特殊的，那么他们的生命历程是什么样的？他们的家族成员情况怎么样？他们与周围人有什么样的勾连，怎样的交往呢？大量宦官墓志的发掘帮助我们生命史的角度探析宦官这一特殊群体的本来面目。

总之，笔者希望从新的角度对宦官群体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并看到一个更加立体的宦官群体形象。他们是否拥有和常人一样的家庭、家族关系？因宦官而显赫的家族拥有怎样的痕迹？他们在与民间社会的接触中与士大夫的实际交往情况是怎样的？是否在国家政治上有所反映？明代的宦官群体在国家机器运行过程中充当了何种角色？他们作为宦官对明代的边疆有何特殊意义？作为少数民族的一分子又展现出哪些特殊的形象？透过对他们行迹的呈现，是否可以引起我们对明代民族关系有新的思考，从而进一步了解明代国家机制的内部结构？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一 相关理论的反思

对于宦官这样一个传统政治史的重要课题，前辈与时贤旨趣各异的研究

究著述汗牛充栋、蔚为大观。<sup>①</sup>通过对学术史的爬梳，笔者以为，在以社会史视角重新审视明代宦官政治的研究之前，学界对明代宦官的研究，依据其研究旨趣与问题意识的差异，大致可以因循政治史、社会史两种学术理路展开追述。而其研究的背后仍受传统儒家士大夫的道德标准束缚，这种传统意识形态与政治史视角交叉作用于当今学者对宦官问题的研究当中。

回顾 20 世纪以前，即作为近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兴起之前的宦官史料，多延续正史的书写方式，形成了对宦官极度鄙夷、大加贬斥的社会舆论传统。主要体现在：首先，“刑余”之身为儒家士大夫所鄙视；<sup>②</sup>另外，正是认为宦官是“刑余贱隶”的传统态度，宦官相应地一概成了“奸”、“恶”、“小人”的代名词；<sup>③</sup>最后一种导向，也就是当今的史家在研究宦官问题时仍难以摆脱的模式，即将宦官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被剥离出来，被定名为传统社会的一颗毒瘤。<sup>④</sup>

显然，在士大夫所撰的史书中，儒家道德是评价人物的标准，宦官“刑余贱隶”的身份参与到政权中来，注定其成为“乱政”、“误国”的罪魁祸首。因而，在 20 世纪以前的旧史学研究模式下，对宦官记载和研究体现出明显的经世致用目的，即“以史为鉴”，防止宦官之祸造成君权旁落。明朝人张世则撰《貂珥史鉴》原因更为直接：“宦寺贤者，万中不

① 相关综述文章参见冷东《建国以来宦官制度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 年第 9 期；景有泉《十年来宦官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90 年第 7 期；刘咏聪、冷冬《近四十年来港台地区宦官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 年第 12 期；吴梧《十余年来对明代宦官的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92 年第 3 期；冷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宦官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0 年第 3 期。

② “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晖于门闾，肌肤莫传于来体”（《后汉书·宦者列传》后论）；“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汉书·司马迁传》）；“古之宦者皆出于刑人，刑余不可列于士庶”（《金史·宦者传》序）；甚至在统治者的眼中太监也是最下贱的奴隶，“太监最为下贱，虫蚁一般之人”（康熙二十年正月初六日清圣祖训谕）。

③ 宋代士大夫苏洵便曾斥其为“阴贼险诈”的“小人之根”（苏洵《上仁宗皇帝书》，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宫闈典》卷 135）；明代统治者认为“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明史·职官志》）；清代统治者也有“古来太监良善者少”（康熙三十三年闰五月十四日清圣祖训谕）的言论。

④ 历代史书中，这类评论举不胜数：“宦者之害，如毒药猛虎之不可拯”（《金史·宦者传序》）；“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新五代史·宦者传》后论）。

得一二。世则方指陈炯戒，将以启迪君心。”<sup>①</sup>

## 二 政治史范式下的宦官问题研究

20 世纪以前的旧史学，我们称之为传统的精英政治史，是特定历史时代及其学术需求下的产物。这种情形体现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上，那就是历史著述的主要内容都是政治史，所依据的材料都是政治方面的文书档案，把政治层面的因素（包括重大政治事件、重要政治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看成是决定历史发展变化的关键力量，同时尽量从政治方面去解释历史。<sup>②</sup>

进入 20 世纪后，传统史学还有很大影响，但新的研究方法、史学理论和史料的运用使得史学研究与传统史学已有很大的不同。这同样体现于明代的宦官研究中，但具有鲜明的政治史范式的色彩，政治制度的研究角度，直到今天仍是研究者的主要视野。

### 1. 关于宦官专权的研究

宦官问题，在 20 世纪前半期问津者不多，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才逐渐热门，有关明代宦官制度的研究，从时间和篇幅上首推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一书。<sup>③</sup>该书是论述全部明代特务系统的，但实际却以宦官制度和宦官活动为主体来进行研究。这是一部传统政治史范式下的典型作品，其特点有三：一是以丰富的政治史料为依据，未突破传统史料范围；二是运用了现代阶级分析的理论套用于明代宦官的研究，正如作者在原自序中所写到的“利用历史事实绕个弯儿来隐射，恰好明代是特务最为凶横的朝代”，所以借以隐射“蒋帮特务的镇压、逮捕、屠杀”，“企图通过明代特务政治的叙述来描绘出明代以帝王为首的地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政治压迫的全貌”<sup>④</sup>。这部书可以说完全是因新中国成立前在“国统区”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做的，这种将制度史的研究过于附靠在意识形态的需要之上的做法，必然使学术研究偏离正常轨迹；三是其逻辑是政权可以由宰相士大夫来操纵，但不能落在“宫奴”手中，否则便在政治、经济、军事等

①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 62《史部·传记类存目四》。

② 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 年第 6 期。

③ 此书始作于 1945 年春，完成于 1948 年末，中外出版社 1950 年版。

④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各方面为祸天下，从中明显可窥见儒家道德标准的影响。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反思这部《明代特务政治》，可以看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宦官专权的历史记忆被唤醒用来影射现状，而政治史料在史者意识形态指导下用来做出有利于主题的解释并强调其干政祸国的一面，宦官的其他方面被忽略或者从历史记忆中删除了，只留下几个恶贯满盈的名字。

继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之后，宦官问题再度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政治制度依然是明代宦官研究的主要视角，宦官专权是研究的主要课题<sup>①</sup>，但由过去主要着眼于政治权势<sup>②</sup>、特务活动<sup>③</sup>，扩展至从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各方面的关系，以及主要宦官生平等多个角度构建明代宦官的政治概况，相关的论文也呈现出这样的特色。<sup>④</sup>对于宦官在经济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宦官参与对经济的破坏作用。王春瑜、杜婉言较早对此进行了探索。<sup>⑤</sup>而明代宦官对军事领

① 蒋丰：《洪武年间委权宦官考实》，《南开学报》1982年第1期；张绍祥、李宪庆：《朱元璋罢相与宦官专权》，《南开史学》，1980年第2期；田禾：《明太祖严取宦官试析：兼及朱元璋的评价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4期；王德金：《朱元璋取宦之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谢景芳：《假皇帝与代管家》，《齐鲁学刊》，1996年第2期等研究。都将明代宦官专权、擅权的祸根归于朱元璋的废相，加之取宦不力导致后代宦官有机会干政。

② 郭厚安：《假皇权肆虐的奴才——论明代的宦官》，《甘肃师大学报》1980年第1期；王春瑜、杜婉言：《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学术月刊》1984年第6期；栾成显：《论厂卫制度》，《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都认为明代宦权只是皇权的一种转化形式。

③ 厂卫制度的研究是明代宦官制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韦庆远：《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中华书局1979年版；王宏志：《明代的宦官与厂卫》，《文史知识》1982年第3期；廖心一、栾成显：《论厂卫制度》，《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④ 欧阳琛：《明代的司礼监》，《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黄才庚：《明代司礼监专权对奏章制度的破坏》，《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2期；梁绍杰：《明代宦官教育机构的名称和初设时间新证》，《史学集刊》1996年第3期，等等。

⑤ 杜婉言：《明代宦官与明代经济》，《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分析了明代宦官参与经济的原因、表现、经济地位及造成的恶劣影响，指出明代宦官参与经济使明朝加速了自身崩溃的过程。杜婉言还和王春瑜合撰了《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学术月刊》1984年第6期；二人共同编著了《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从大量明代及部分清代文集、笔记、奏疏、野史中，选出一百五十种，从中选辑出有关史料，章节前后都有按语，分类介绍所列史料的学术价值，并列所用书目及版本，可弥补常见书之不足。此外，杨涛的《明朝万历中矿税监进奉内库考》，《云南师大学报》1986年第6期；张桂林的《税珣高家乱闻述略》，《福建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孙文良：《矿税监高淮乱辽述略》，《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上述文章从不同的侧面，详尽地分析了宦官对明代经济的摧残。

域的介入亦强调其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及国防败坏，加速明朝的灭亡。<sup>①</sup>对于明代宦官在外交方面的作用，虽肯定了其积极的一面，亦不脱离宦官干政的主题，认为其外交行为为宦官干政奠定了基础。<sup>②</sup>在如此诸多相关宦官专权问题的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宦官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下被剥离出来，被定名为传统社会的一颗毒瘤”<sup>③</sup>，激化社会矛盾，恶行累累。<sup>④</sup>

## 2. 国家政治权力网络中的宦官的研究

而实际上，宦官作为国家政治权力网上的一个结点，是国家机制运转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发挥作用却要受制于整个权力网络。吴缉华在20世纪60年代从明代政治制度的缺憾上论证了宦官专权的必然性<sup>⑤</sup>，深

---

① 陈表义、谭式攻：《明代军制建设原则及军事的衰败》，《暨南学报》1996年第2期，阐述了明代军事建设的原则，叙述了侵权制约在军事机构、官员任命等方面的体现和屯田养兵的目的、制度、成绩。阐发明朝中叶以后军事上衰败的表现及与宦官预军的关系原因。内臣监军，不仅压抑了武将的积极性，而且使政风更加败坏，也败坏军风，导致将士离心，上下解体。冷东：《明代宦官监军制度述略》，《汕头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认为明朝宦官监军的制度是失败的，它导致了军队战斗力下降及国防败坏，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② 孙卫国：《论明初的宦官外交》，《南开学报》1994年第2期。

③ 张宏艳：《明清宦官的终老与京师寺庙——兼论明清宦官与京师民间社会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1年。

④ 周裕兴：《明代宦官与南京》，《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论述了明代南京宦官的设置、南京是明朝宦官的处置之地、明朝宦官在南京的恶行等内容；杨三寿：《明宪宗时期的云南镇守太监钱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明宪宗在商品经济活跃的刺激下，派太监钱能镇守云南，为其括敛钱财，钱能在滇12年，残酷掠夺，操纵官吏的升降，挑起边乱，使云南的社会矛盾日趋激化。

⑤ 吴缉华：《明仁宣时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僭越相权之祸》，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1本，1960年12月，该文论证了三杨辅政与内阁制度的改变、内阁制度之变对宦官僭越相权的影响、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王振专权之祸，从明代政治制度的缺憾上论证了宦官专权的必然性。许安妮《评介吴缉华〈明仁宣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僭越相权之祸〉及张存武〈说明代宦官〉》，台湾《师大史学会刊》第24期，1980年7月，一文即对吴文多所推介。



化了对该问题的研究。冷东<sup>①</sup>、方志远<sup>②</sup>、欧阳琛<sup>③</sup>、李绍强等人<sup>④</sup>，亦从这一认知出发，对明代宦官群体在传统社会政治网络中的位置和活动内容展开探讨。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政治制度史自身的完善与规范，加之西方史学新方法的引进，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史料运用的广泛性加强，对于宦官问题的研究也更深入彻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余华青的《中国宦官制度史》，全面探讨了我国历代的宦官制度及其演变发展过程。作者在坚持传统政治史视野的同时，吸收西方新方法，从生理学、心理学角度探讨宦官的行为方式、心理特征及性格内涵。试图给宦官制度比较公允的评价，“评价整个宦官制度与评价具体宦官人物两者应当区分开来，不可一概贬斥；评价宦官的政治危害作用与评价宦官在其他领域中的某些积极作用，两者应当区分开来，不可一概抹杀；对于上层权阉与下层宦官的评价，应

---

① 冷东：《明清两代宦官专权与封建专制的关系》，《汕头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认为宦官能否专权，取决于皇帝个人的能力，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政策和自身的民族特点，取形于国家机构的完善程度和效能，宦官专权是封建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另一篇文章《明代宦官监军制度述略》，《汕头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认为自“靖难之役”始，宦官的作用不仅成为战争中的应急手段，也成为取代藩王的地位、弥补军事战略和军事思想出现的真空制度，促使“靖难之役”以后，明朝军事战略的重心从藩王转移到宦官身上，即从“家人”转移到“家奴”身上。

② 方志远：《明代的镇守中官制度》，《文史》1995年第40辑，指出镇守中官始设于永乐末年，宣德以后形成制度并普遍设置。镇守中官分为南京等处守备太监、诸边镇守中官和各省镇守中官三种，职责分别是护卫留都、监军守边、安民。在省级单位中，镇守中官一度与总兵、巡抚并立。但镇守中官的权力也受到多重限制，已完全纳入地方政治制度之中。其另一篇文章《明代的“知识宦官”》，《文史知识》1990年第7期，指出在明朝已出现了知识宦官，而“不管是哪一类知识宦官，他们所接受的，都是儒家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标准，尽管他们之间矛盾甚多，与朝臣更是争权夺利，但对皇室却是忠心不二，对皇位更无非分之望，加上明朝自太祖以来建立了一套严密的政治制度，各种势力相互制约，因此，再专权的宦官一旦失去皇帝的信任，即立遭贬斥而全无反抗余地”。

③ 认为明朝没有重蹈东汉、唐的覆辙之因：“一是明代中央集权制度的成功。如在地方实行三司制和分道监察制，基本上阻止了地方割据势力的抬头。二是明统治者政治上运用‘彼此颉颃、分而治之’的策略起了作用。”（欧阳琛：《明代的司礼监》，《江西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明朝“统治者对监、阁权力相制衡的运用，使明后期没有出现汉唐那样的‘宦官之祸’”。（《明内府内书堂考略——兼论明司礼监和内阁共理朝政》，《江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

④ 李绍强：《皇帝、儒臣、宦官间的关系与明朝政局》，《齐鲁学刊》1988年第2期，指出明代皇帝、儒臣、宦官三者之间，皇帝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